齐鲁晚报 齐鲁晚报

走不出的环卫工世界

文/片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她被称作“史上最敬业的环卫工”——每天打扫广州市区内三个小区的卫生,却不拿工资。

事实上她早已不是环卫工。

12年前单位改制,她丢掉了工作,只拿了4000块钱补偿,“怎么想也想不通”的她精神失常了。于是,从此她穿着以前的工作服,自费买了清洁工具,开始打扫住处附近的小区——她还以为自己是在12年前的单位上班。

虽然生活在广州,可她没有编制,没有本地户口,甚至连下岗工人最微薄的待遇也享受不到。现在她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她曾是这个城市的一名环卫工。

▶“广州市外来人员临时工作证”是罗瑞珍工作13年拿到的唯一一个工作证。

罗瑞珍在扫扫卫生。(资料片)

一个“纯粹的劳动者”

在广州市白云区东方名智苑小区,罗瑞珍是个有点特别的名人。

小区里没人不认识她。十几年来,每个人都见过她卖力干活的身影。这个身材有点微胖、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总是以一副固定的形象出现:穿着蓝色的环卫工作服,不声不响地扫地、刷垃圾桶、冲厕所,哪里脏就在哪里干。

邻里街坊都称赞她勤快,“小区卫生搞得越来越好”。小区里有个公共厕所,很难清理干净。罗瑞珍自己掏钱买了十几米长的水管冲洗厕所的墙壁和地板,“刷得白白的”。

罗瑞珍不仅在自己住的小区里干活,周围的小区解放庄、白云花园她也去,一圈忙下来就到了晚上。东方名智苑小区的治安员老刘多次见她“在昏黄的路灯下扫地”。

这一幕让58岁的老刘感受有些复杂。

除了罗瑞珍本人,大家都清楚,她其实并不是这三个小区的环卫工。

这个50多岁的老太太曾是火车站附近的环卫工人,十多年前因为经受不住失业的打击,精神失常了。从此她在自己住处附近的小区“重操旧业”,试图将一切恢复如常。

十多年来,她和从前一样卖力工作。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工资可拿。

老刘很唏嘘:“她家那么苦,儿子当公交车司机,有两个小孩要养。要不是脑子受了刺激,她不会去打一份工吗?”

在广东媒体的报道里,罗瑞珍被称为“史上最敬业的环卫工”:起早摸黑,风雨无阻,不收分文,还自掏腰包购买清洁器具。有人感叹她是一个“纯粹的劳动者”。

对此,罗瑞珍的家人只有苦笑和无奈的叹息:“不想她这么干,可是她不听劝啊。十几年了,一直这样,只有顺着她,她才不会在家整天唠唠叨叨、摔东西骂人。”

13年工龄和4000块补偿

罗瑞珍和儿子一家搬到这个小区11年了。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儿子廖亚宾当公交车司机,儿媳在鞋店帮人卖鞋,并没有多余的财力和心力支持母亲当一个“纯粹的劳动者”,拮据的家庭收入甚至连让母亲当一个“纯粹的精神病人”都不行。

罗瑞珍这十多年来只在发病初期进过一次精神病院治疗,后来因为住院费用太贵,“一天要好几百”,儿子廖亚宾只好将母亲带回家里。又因为两口子工作太忙,无暇照顾患病的母亲,最后只能向整天往外跑的母亲妥协,“随她去吧,只要不伤害人就行”。

罗瑞珍的老伴廖旭向记者讲述了他和妻子相似的工作经历——在同一个环卫单位工作,一个工作十年因为请假不批被迫辞职,一个工作13年由于单位改制被炒鱿鱼,只拿到4000块补助。

1986年,廖旭夫妻俩带着儿子女儿从老家茂名市新安镇平田村来到省城广州谋生。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当时的广州越秀区公厕卫生管理队。

清理公厕是一件又累又脏的活,公厕卫生管理队有几十个环卫工,绝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罗瑞珍因为认真肯干,“刚进来就当了班长”。

女儿廖燕妮说,自己和哥哥就是靠父母扫厕所养大的。十几年来,一家四口就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格子间里——单位在放工具的楼上加盖了一层,八间屋子,一格一格用薄板隔开,每格住一家人,厕所和厨房是公用的。

干了七八年后,罗瑞珍“升职”成了检查员,由洗厕所变成了监督其他工人洗厕所,检查卫生。

1996年,廖旭决定用夫妻俩十年来攒下的四万块钱回老家盖房子,向单位请假时却遭到了拒绝,领导表示没人能替班,“或者请假,或者辞工”。

廖旭无奈只能辞职。

三年后,因为单位改制,罗瑞珍突然失业,只拿到了4000块补助,其中还包括当月的工资。和她同时失业的还有十几名临时工。

罗瑞珍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当时单位里的人都说,干满十五年,就能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以后退休了就能享受正式工的退休待遇了。

13年的辛勤工作一夕之间化为泡影,罗瑞珍怎么也想不通,于是她精神失常了。糊涂的时候她觉得自己还在原单位上班,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附近打扫厕所。有一次,因为看到有人偷东西上去提醒,还被几个小偷揍得鼻青脸肿。

“她老是骂我,不帮她去要钱,她干了这么多年单位都不给她发工资。”廖旭说,罗瑞珍自从精神失常后,就喜欢自言自语,有时候突然暴怒,家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她总挂在嘴边的就是当年那四千块钱,“怎么也忘不了”。

丢了工作以后,从前的格子屋也不能再住了。2000年,一家四口搬到了白云区东方名智苑小区。这片小区是投资商和当地政府共同开发的过渡房小区,上世纪90年代开盘,只有30年的使用期限。廖家花光了最后的积蓄,用三万块买下了20年的居住权。

前两年廖旭又找了一份看管停车场的工作,每个月500块钱,跟1996年在公厕卫生管理队一千多点的工资比,降了一半,“那也没办法”。

只有罗瑞珍还活在过去的世界里,她又拿起了扫把和垃圾铲,穿上了从前的工作服,打扫起东方名智苑和附近小区的卫生。

“她还是不甘心。”廖旭记得,一开始罗瑞珍总是回火车站那边扫厕所,不让她去她就“眼泪汪汪”,廖旭只好再找原单位,商量能不能每个月给她一点钱当伙食费。单位不同意,还让他看好罗瑞珍,“做好她的思想工作。”

“她脑子都糊涂了,还怎么做思想工作?”廖旭没有办法。他觉得妻子恐怕一辈子都走不出来了。

绕不出去的圈子

罗瑞珍当了十几年“义工”的事情被报道后,离家不远的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愿意免费提供治疗,这让已经放弃治疗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

8月3日,罗瑞珍被接到心理医院。而老伴廖旭和女儿廖燕妮就临时住在儿子家照顾她。

一共30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室一厅,卧室睡着廖亚宾夫妇,原本安在电视机斜上方的吊床是给罗瑞珍睡的,现在廖旭睡在那儿,每天得爬梯子上去。廖燕妮睡在木沙发上。

“要是医院能帮她治个八九成,我们带回家吃点药能控制住,就满足了。”廖亚宾不想让母亲再这么辛苦下去,“每天早上5点多就出门了,比我上早班起得还早。这么累为什么?有时候她自己心里也难过,晚上就在床上用力捶墙。”

房子还有不到10年就到期了。到时候是能续住还是拆迁,没有人知道。如果不能住,附近的房价如今已经到了一万至两万一平方米,要买房子,“两辈子不吃不喝估计才可以。”

虽然母亲免费住院了,可廖亚宾仍然在不断叹气。他的一句口头禅是“说句不好听的话”,“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是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我们这样的人,是绕来绕去绕不出那个圈子了。”

孩子画笔下没有城管小贩

文/片 本报记者 石念军

▲8月20日,夏健强独地看着自己的画。

8月20日,一场名为“夏健强的画”的画展在武汉开展。

陆陆续续有人进来参观,展室内偶尔响起一两声叹息和唏嘘,11岁的夏健强只是呆呆地注视着他的画,仿佛没有听到。而一旁的母亲张晶明白,这些声音不是冲着画,而是冲着夏健强的父亲——沈阳一个名叫“夏俊峰”的小贩,两年前,曾拿刀刺死两名城管。

因为父亲,这个孩子连同他那童稚的画作,一并走上了台前。

因为爸爸

8月19日的武汉异常闷热。

在湖北美术学院宿舍院内的一家旅社里,夏健强依偎着妈妈,一个劲地喊热。这是他们来到武汉的第二天,闷热的天气让一直住在东北的小健强很不习惯。

如果不是受邀举办一场画展,夏健强和妈妈压根就不会来这里。

即将年满11岁的夏健强,是沈阳当地少年宫的知名小画家。据妈妈张晶讲,孩子6岁半开始学画,很快就展露天赋。连续两年参加一项全国性绘画比赛,都获得了东北三省赛区的一等奖。

但这一次,真正促成画展的,并不是他的画。

虽然是闲聊,但两年前的那场纷争却在下意识中没有绕过去。一提到这个话题,张晶立刻示意儿子出去。

夏健强很快转身出门,两年多了,这个场景他已再熟悉不过。每当有记者造访,妈妈都要把他支出去,不让他听到。

他只知道妈妈的谈话内容一定和爸爸有关,虽然到现在他也不清楚,在爸爸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只知道,爸爸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而妈妈说爸爸是出了远门。

他也不知道,两年前的5月,爸爸因为摆摊与城管发生争执,结果两名城管死在了爸爸刀下。而“夏俊峰”这个名字一下子被大家所熟知。

带上屋门时,夏健强转身做了一个鬼脸,冲妈妈眨巴几下眼。但当他的眼神转向记者时,却是胆怯中带着一丝狐疑,然后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

“如果不是在武汉,而是在沈阳,这个画展我们打死也不会办。”张晶叹气,“答应办这个画展,也是希望大家对这个案子的关注别冷下来,还能救他爸爸一命”。

就这样,夏健强被推到了台前。

画作里的童年

6岁半开始学画的夏健强,笔下的世界色彩斑斓:一个孩子如天使般飞向妈妈的怀抱;孩子在浴盆中嬉戏;黑白相间的奶牛在草原上吃草;红花在绿叶掩映下姹紫嫣红;黑线条的“自画像”上,夏健强圆瞪着大眼睛……

这是夏健强眼里的世界,也是他童年的见证。

虽然父母只是沈阳五爱市场门口“两个卖烤肠的”,但穷孩子也是家里的一块宝,夏健强从小就是夏俊峰夫妻俩的骄傲,他曾连续两年获得东北三省绘画比赛一等奖。老师经常劝夫妻俩带着夏健强去北京参加比赛。每当这时,夏俊峰两口子只是无奈地苦笑。一万元的花销对这个贫寒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

但嘴上说着“不敢想”,暗地里,两口子却一直小心翼翼地攒钱,准备送孩子去北京参赛。

钱攒得差不多了,眼看着孩子7月就放暑假了,“就差那么一点”,悲剧发生了。

2009年5月16日,在沈阳风雨坛街的路口,正在支摊的夫妻俩被突然出现的城管逮个正着。随后,夏俊峰随同执法人员到勤务室接受处罚。这一过程中,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他摸到了兜里装着的小刀——那把用来做生意削香肠的小刀,向城管身上扎去,两名城管死亡。

出事后,一向被父母视作骄傲的夏健强变得沉默,敏感,但他更喜欢画画了。他常常坐在画板前,铺开一张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用习惯的左手,涂涂抹抹,描绘自己看到的和想象的世界。

另一扇窗户

爸爸出事两年后,夏健强终于第一次来到北京。但这次既不是参赛,也没有父亲相随,而是网友“太极老兵”发出了邀请,他希望能给孩子些许心理辅导。

在北京的13天里,夏健强不仅跟“太极老兵”学会了陈氏太极拳的套路,而且看到了天安门。就当夏健强兴高采烈时,“太极老兵”却在感叹“双方都是体制乱象的牺牲者”。

像“太极老兵”这样的人还有许多许多。

夏俊峰一案经媒体报道后,这个底层家庭的生活状态为更多人所关注。许多人抱着不同的心态,几元、几十元、几千元、几万元,善款源源不断打到张晶的卡上。仅仅3天,就筹集了17万元。

而夏健强的画展,也是出于好心人的资助——武汉青年画家龚剑几次从张晶的微博上看到夏健强的画,他与工作室的几位伙伴一拍即合:为孩子办一场画展。

这位有着短暂记者生涯的画家,曾多次听闻小贩与城管之间的冲突。但这一次,他更多看到了一个家庭的无力:“办画展,不仅是展现孩子的天赋,更想让人们知道这样一个家庭的悲剧,和这对母子的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无能为力。”

同样是从微博上看到了夏健强的画,北京一位杂志的主编,与爱人专程找到他们,执意留下2000元钱,买走了那幅孩子如天使般飞向妈妈怀抱的画。

这是夏健强第一次有机会为爸妈做些什么,虽然他还未满11岁。而张晶心里盘算的是,是不是可以把孩子的画全部卖掉?如果能够卖一点钱,也好有能力支持孩子今后继续画下去。毕竟,画画是一件很费钱的事,纸和颜料都很贵。

此时,距离最高院死刑复核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时间越久,张晶心里便越是没谱。

而8月20日,出现在自己画展上的夏健强,仍是一副沉默不语的样子。

这是一场略显简陋的画展,41张小小的画,一一挂到墙上,供往来的人们观赏。每个来的人,都会在看画之余,仔细打量一下画前这个孤独的孩子,留下一两声叹息而去。

此时的夏健强就如一扇窗户,透过他,人们正在试图发泄或者唤醒什么,也在试图通过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夏俊峰案。

在来了又走的人群中,画展的主角夏健强,一副默不作声的样子,宛如一个小小的局外人。

▶未满11岁的夏健强,有时眼神却显得很复杂

14岁的刘俊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从老家河南来到台州,看到父母竟然是住在“那样的地方”。几间依着高高的坟头搭建而起的棚子就是自己即将入住的家。而小伙伴们就在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墓碑前玩耍,很开心。

这是位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城乡接合处半山腰上的一片坟墓区。数个油布大棚如同杂草一样“生长”在这些高低错落的坟墓旁,一些打工者(大多来自安徽、河南等地)和他们的孩子就常年住在这里,这里是家,也是孩子们的乐园。

▶刘俊峰和弟弟妹妹在墓园里玩耍。

墓园里的童年

文/片 本报记者 龚海

活人

8月16日,刘俊峰爬上高高的坟头,双手紧紧扶着上面的石相生,蹲在那里。

弟弟妹妹还在下面的墓园里追逐奔跑,刘俊峰懒得理他们。14岁的刘俊峰眼里写满了深沉和忧郁,对他来讲,这是个过分悠长的暑假,他无聊地趴在坟头上快睡着了。

刚一放暑假,刘俊峰就跟着伯父从河南驻马店的农村老家坐长途汽车来到台州。

已经多年没有见到父母,重逢后,刘俊峰却一阵失落。

父母的生活与他之前的想象出入太大,繁华、热闹原本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在见到父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盖在半山腰上的两间简陋棚子,紧挨着它们,是用水泥建造的结实而气派的墓地,大片连营,将棚户围在了中间。

除了数不清的死人,这里共住了5户活人。若非旁边山道上偶尔有汽车驶过,这儿简直闻不到城市的任何气息。

父亲刘胜利在一家小作坊式的制冰厂里打工,他穿着灰色的工服,乱蓬蓬的头发,走到厂子外面站着抽支烟,家就在脚下,一目了然。他的越南妻子在一家加工企业当熟练工,地方稍远,但工资两千出头,比刘胜利要多。

三个孩子被刘胜利圈在家里,不让下山,他担心城里车太多,人太杂,地方太大,只有山上这巴掌大的地方他最熟悉。

多山的台州夏天炎热难当,家里又闷又热,电视勉强接收到的几个频道对孩子们毫无吸引力,三个孩子按捺不住,只能跑到一旁迷宫似的墓园里玩。

对一直跟着父母生活的弟弟妹妹来说,墓园是他们的乐园,他们像是这片墓园真正的领主,在里面追逐,恣意地踩着坟墓上斑驳的砖墙,来回跑跳。

但刘俊峰有些不习惯。

晚上,有时他们会在墓园里吃饭,墓碑前有难得的大片水泥硬化地,修墓者当年还煞费苦心地安装了雕工精细的石桌石凳,没料到会做了活人的餐桌。

比较起来,刘胜利棚子里的桌子就寒碜很多了。这个家,四角是木头的立柱,外面裹着旧的黑色遮雨布,破处被堵上了大小不一的木板,两个床垫摞在一起,搭在砌好的砖头上。一辆豪爵摩托车是家里最值钱的宝贝,至于其他家当,刘胜利可以一概不管。

孩子们更愿意坐在棚子外面的一款破旧皮沙发上,那是收破烂的邻居淘来的,还没舍得卖。

短尾巴的小狗路路是捡来的,它成了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儿,时常眯起眼任兮兮的眼睛趴在刘俊峰的腿上。

搬家

5年前,刘胜利定居于此。当时,他来台州不久,拉过三轮车,而城里高昂的房租让一家人不敢想。于是,在老乡的介绍下,他躲到这片墓地边扎根。

房子半个月就搭好了,才花了2000块钱,比城里300多块钱租的屋子要大不少。

住下来后,就有后来者如法炮制,到最后竟然有5户人家都在这儿搭了房子,除了两户是安徽人,其他的都是河南同乡。

8月初时,梅花台风将至,据说要在台州正面登陆,一时间全城戒备,刘胜利也紧张起来。

刘胜利花20块钱买了水泥拉上山,找来一个老乡帮忙,加固一下墙角四柱,再在窗前糊起一道水泥挡水,剩下的就只能寄希望于屋后的墓园做挡风的屏障。

两天后,台风登陆,一路往北甚至刮到了朝鲜,却放了台州一马,刘胜利虚惊一场。

这不是房子最后一次面临威胁。几天后的8月9日,刘胜利和房子必须说再见了。

那天,棚户前突然来了十几个人,有政府的,也有丁否村的,他们要求刘胜利把房子拆掉,理由为它是违章建筑,这里的所有棚屋都得拆,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只上过小学一年级的刘胜利这时才知道,正是他像生活被曝光,才引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当地的摄影师原本只是为了反映他家的实际情况,不过刘胜利说自己太老实,掏心窝子说了很多话。后来孩子们在墓园尽兴玩耍的照片被登在了报纸上,摄影师还给他送来一张全家福,也是他家唯一的一张照片。

相关报道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据当地记者讲,有关领导做出批示,要求妥善解决刘胜利等几户人家的实际困难。

刘胜利挨到了最后一刻,有在场者说刘胜利甚至跪下来求情,但最后还是回到屋里,搬出几件还能用的家什,再自行把房屋拆除干净。

有邻居骂刘胜利,是他引来了记者,落得大家最后无家可归,还骂他收了当地政府单独发给他家的大米、牙刷脸盆等生活用品,他被收买了,而其他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刘胜利觉得自己两头不是人,他向记者抱怨:“你们为啥要把孩子家呢,烦得很,你看看那些收破烂的,拉车的,有的生活还不如我呢。”

离别

下山后,制冰厂的老板将山下空闲的三间板房留给刘胜利暂住。

板房紧挨着污水处理厂的泵站,房子很矮,没有厕所,屋顶上盖着铁板,夏天像个蒸笼,热得刘胜利和孩子们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刘胜利越发怀念山上的住所。他说,如果村里在那儿盖上房子,哪怕他付租金去租,只要不太贵也行呀,毕竟住在那儿都有感情了。

离开墓园的生活是不正常的,上班前,夫妻俩需要把孩子送到一起打工的乡亲家里托管,刘胜利甚至恶狠狠地说:“孩子丢了算了,还减轻点儿负担。”

新家里,依然没有值钱的东西,出门时,夫妻俩甚至都懒得锁门。

8月中旬的一天,刘胜利破天荒地买了鸡肉,因为大儿子刘俊峰晚上就要被送回河南老家了,妻子抓紧时间把肉炖上。

刘胜利实在是忍无可忍,住的地方还没安顿下来,孩子就要开学了,大儿子只能回老家继续上学,这一走至少又是一年不能见面。

过了一会儿,刘胜利的大哥火急火燎地赶过来,当晚回驻马店的长途车要提前走,他俩得赶紧出发。饭还在锅里,但已来不及吃,刘胜利把刘俊峰往摩托车上一架,妻子拉着两个小的在后面跟着,经过路边的健身广场,他们看到小朋友打玩得正高兴。

半个小时后,他们会在车站做一次普通的离别。刘胜利一定还会叮嘱刘俊峰要好好学习,因为他嫌自己没有文化,挣钱的活儿都干不了。

刘胜利每天上班还要经过那片墓园,但他不想再在制冰厂干了。他准备去上海,听说那边一个厕所都值十来万,他不假思索地说:“消费高,可能挣的钱也多吧。”